发展与现代化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对党的未来走向的深刻揭示。

□ 林学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科学论断，总结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彰显着共产党人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

“最大的政治”须寻求“最大公约数”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心是决定历史走势的最强大政治力量，人心向背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比。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在军事和经济力量方面占着明显优势，但是毛泽东预判：“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仅用三年多的时间，就从根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取得了执政地位。究其原因，正是“人心不顺”的逆向运动与“人心归向”的相向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共双方的命运。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人心归向”，归根结底，是因为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实行民主选举，保护民族工商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不但赢得了解放区人民的欢迎，还赢得了民主党派、国统区人民的支持，因而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得到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拥护、支持，以自己强大的人力资源、民心资源弥补了军队数量和装备力量的不足。对此，美国记者这样评论：中国民众对共产党军队的支持大大抵消了美国所能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军事援助。这就告诉我们，党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也就是赢得人心，就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须准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

今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就是“最大的政治”的逻辑推演。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而争取人心的关键，是我们的施政方针和策略必须求取“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说，“最大的政治”要通过求解“最大公约数”而得到证明。“最大的政治”与“最大公约数”的理论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执政逻辑：党和人民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最大的政治”须避免“最大危险”

把“人心”视为“最大的政治”，把密切联系群众视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同时，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深刻地认识到，失去人心、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这绝非危言耸听。纵观世界各国政党执政的经验，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失败的教训，从“最大政治优势”到“最大危险”只有一步之遥，从“密切联系群众”到“脱离群众”只是一念之差。曾几何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赢得了广大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得到了广大民众的信赖和支持。苏联解体后，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反思时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应该讲，这是针对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深刻反思的结果。布尔什维克这个曾经的多数派，没有找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大公约数”，背离了人民，最终只会走向灭亡。

不可否认的是，从革命到执政，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观上感受不到一旦脱离群众立即遭到失败的危机压力，使脱离群众的问题也一下子突出起来。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破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从“打虎”行动到“猎狐”行动，从中央巡视组的“问题清单”到中纪委官网的“正风清单”，其目的就在于固本强基，收复民心“失地”，防止人心“水土流失”，党心民意产生了强烈的共振、共鸣。

权衡得与失，收获最大的红利莫过于民心。而这种“民心红利”，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党的优良传统的回归，是对“最大危险”的防范和应对。这种“民心红利”的获得，一方面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另一方面又转化为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和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动力支撑。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执政者必须避免“最大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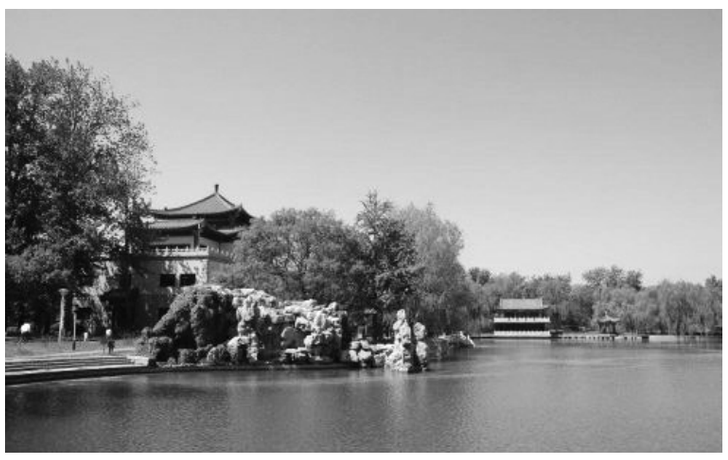
“最大的政治”须保持“最大优势”

我们党90多年的风雨历程昭示了一个铁的事实：无论是在顺风顺水时的预防风险，还是在关键时刻的找准航向，或是在危难时刻的力挽狂澜，都靠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政治优势赢得人心，走向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继续保持“最大的政治”的“最大优势”，应做到以下几点。

明确角色定位。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这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来自人民回答了来自谁的问题，反映了党的本质属性；植根人民回答了依靠谁的问题，揭示了党的动力之源；服务人民回答了为了谁的问题，宣告了党的奋斗宗旨。

坚持根本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为此，我们必须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讲究方式方法。正确的方式方法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保障。认真贯彻执行已有的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制度，大力弘扬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条件较差和情况复杂的地方去，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需要善于研究和把握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工作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增强群众工作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提高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专家视点

看淡自身『舒适度』

□ 戴焰军 李英田

吃苦与享乐、自身舒适与群众满意，始终是党员干部应该回答好的人生必答题。围绕党员干部的舒适度，习近平同志多次作出深刻论述，“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会影响到领导干部的舒适度”，“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可见，怎样看待个人的舒适度、追求什么样的舒适度、如何处理自身舒适度与群众舒适度关系等，绝不仅仅是党员干部个人喜好问题，更是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是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把人民群众满意放在首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本质特征。让群众过得舒适幸福，理应成为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用自身的不舒适不自在换取群众的舒适满意，也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胸襟气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改作风的各项规定措施，已经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舒适度。受到的约束多了，不舒服不自在是自然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称赞欢迎，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干部的低舒适度会带来群众的高满意度，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这一政治现象概莫能外。对此，邓小平同志深有感触地指出：“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员干部对舒适度的追求，代表党风政风，影响社风民风，关乎群众能否发自内心地信任党、拥护党、支持党。

当然，马克思主义政党绝不是要求自己的成员安贫乐道、做苦行僧，经济社会的进步允许所有人享受正常合理的发展成果。但是，作为人民公仆的党员干部，应该把自身的舒适度看得淡一些，始终把群众舒适不舒适放在第一位，让群众的舒适满意衡量检验自己工作成效。十八大后，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狠刹“四风”蔓延势头。总体上说，干部不正常不合理的舒适度被扼制。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对舒适享乐的追求总有膨胀之势。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一些干部改作风、降舒适度仅仅停留在不敢上，不想的自觉尚未完全形成。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有的干部留恋过去那种“一张报纸一包烟，优哉游哉过一天”的日子。这充分说明，过分追求个人舒适度的问题在一些党员干部内心深处仍然没有抛弃，仍在期待原来的舒适度反弹回潮。总结一些干部在从政道路上栽跟头的深刻教训，很大程度上在于过度追求感官舒适导致思想空虚、精神“缺钙”，陷入恶性循环不能自拔。

对不同人来说，同样的物质条件可能带来不同的舒适度，相同的监督制约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舒适感受既与客观环境、物质条件有一定关系，更与个人的内心世界、精神追求、品性修养以及道德习惯息息相关。可以预见的是，改进作风、从严治党的强劲态势，必定会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将过去习以为常的舒适环境全方位加以限制和约束。党员干部如果不主动加强锤炼修养，校正自己的舒适指数，就会时时处处感到不轻松、不自在，改进作风的成效也不会长久彻底。如何看淡舒适度？首先要心中有信念。缺乏理想信念，丧失精神家园，就容易沉湎于物质享受，热衷于及时行乐；树立了远大志向追求，补足了精神之钙，就会拿出“同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的执著和淡定，筚路蓝缕、手胼足胝，努力朝着奋斗目标拼搏进取，而不会过分眷恋前进途中一餐一宿之满足和一时一事之痛快。其次要心中有群众。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惦记普通老百姓在雨雪天气等车的不舒适，就不会计较座驾的豪华程度；挂念贫困群体度日艰难的不舒适，就不会抱怨公务用餐少了硬菜、没了好酒；体察交通拥堵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舒适，就不会动辄封路清场。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最重位置，个人舒适不舒适的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再次要心中有法规。畏法度者最快乐。严明纪律可能让人一时不舒服，但能避免走向贪腐的邪路，实际这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爱护。要自觉强化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始终用制度规定框住自己的行为，有所畏惧，远离放纵，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样才能在不知不觉中降低对舒适的期待，即便身处不舒适的环境，也难有不适之感。

理论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化，法兰克福学派力图建立一种针对西方社会现状的社会批判理论，主张用批判精神取代经验描述，通过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的反思和批判，以实现人的解放。

□ 刘莹珠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法兰克福学派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为知名的流派之一。该学派成立于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三代学者的发展，至今仍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其主要成员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霍耐特、韦尔默等众多杰出学者。这个学派既代表着一个由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组成的学术研究机构，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化，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用人本主义的立场取代实证主义的立场，用批判精神取代经验描述，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哲学尤其是文化批判，把发达工业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归结为文化问题和道德问题。该学派力图建立一种针对西方社会现状的社会批判理论，通过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的反思和批判，求得实现个体真正解放的途径。

生存状况批判

近代以来，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尤其是启蒙运动对于人类主体性和理性的弘扬，西方文明逐渐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权利。从客观的维度看，现代科学的发展消解了自然对人的限制：知识祛除了神话，实现了对自然的科学认识，解除了人对自然的恐惧与无知状态。从主观的维度看，现代社会摆脱了宗教与传统对人的限制：个体获得了内在的、独立的尊严与价值，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成就自我，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独立地做出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在现代社会中，个体享有丰裕的物质产品、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广泛的选择的可能性。得益于启蒙精神对知识与科学的尊崇，发达工业社会呈现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与繁荣之象。这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面向。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敏锐地发现，在现代生活表面上的自由与丰裕之下，其实潜藏着人性的普遍压抑与异化：生产的机械化导致个体存在的孤立化和原子化；社会对可计算性的要求使得不同事物等同化导致个性的泯灭；商业与利润所催生的消费需求主导了大众生活，使得个体无法自主判断自己的真实需求；技术理性对知识效用性的崇拜使得普遍的道德准则从公众生活中消失，目的合理性消解了价值合理性，即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们只能回答“什么是有用的”的这类问题，而无力回答“什么是善的”这类问题。正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结尾处所写的那样：“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个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空虚与无意义的状态成为被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所支配的个体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样式。人们已经陷入了韦伯所说的那种人类用“工具理性”为自己打造的“铁笼”之中：在其中找不到意义和价值，也找不到安全感；能够找到的，只是疲惫的感官和永远也无法被完全满足的欲望。

理性基础批判

对发达工业社会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的原因，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启蒙本身是一种理想的预期，“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类的真正的解放，而启蒙的现实结果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导致现代人对科技与工具理性的崇拜取代了传统社会中人对上帝的崇拜，造成了现实生活中新的压制与蒙昧。

启蒙的观念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就在于用科学化的、综合化的、工具化的理性去控制自然，也就是信奉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理性，作为启蒙运动最为核心的主张和诉求，本身具有双重的维度，它既具有目的合理性的一面，也具有价值合理性的一面。目的合理性关注的是行动的有效性，即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去求得一个行动的效用的最大化，它以可计算性和效用性作为衡量的标准；价值合理性关注的是行动本身所承载和内涵的价值与意义，至于行动的结果如何、是否有效用并不在行动的诉求之内。比如说，为了养家糊口而工作，那么最合理的选择是从事一份赚钱最多的职业，这是典型的目的合理性主导的行动；而价值合理性的行动则是纯粹地为了践行人生的职责而工作，选择从事一份切合个体本性的职业，而无论报酬高低、社会评价优劣。最为理想的行动状态当然是这份职业既能够实现个体的职责，同时又有不菲的薪资，这就兼顾了行动的目的的合理维度和价值合理维度，从而是在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了理性的行动。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启蒙之所以会走向压制和蒙昧，是因为在启蒙的过程中，只是片面地强调目的的合理性这个维度，或者我们通常所说的工具理性这个维度，而忽视了价值合理性的维度。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不仅支配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改造，同时也成为支配人类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法则。在知识就是力量这一信念的高歌猛进中，属于人类心灵层面的所有情感、道德和价值诉求，所有那些不应当被商品化、同质化、抽象化的人性的东西，要么也被打上了价格的标签，变成了与其他人工产品一样的商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要么就在要求一切都可计算化的工具理性霸权中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因而，启蒙的实际结果是科技成为新的神灵、新的偶像，道德感和崇高感被消解了，人变成了与物一样的存在。

文化基础批判

文化工业的出现，正是启蒙自身走向异化的最典型的表现。由于工具理性的盛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沦为了资本的工具，成为追逐利润的文化工业。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的出现使艺术沦为单纯的娱乐对象，成为资本主义用来瓦解大众批判意识的意识形态工具。

一方面，文化工业的出现使得文化产品可以以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大批量制造，成为可以大规模生产和复制的特殊商品，文化的创造变成了文化的生产，其结果必然使文化产品丧失其应有的创造性和个性。

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具有控制和操纵大众意识的意识形态功能。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控制和操纵，主要是通过它所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不断向人们提供整齐划一和无思想深度的娱乐观念来实现的。在文化工业的有意引导下，所有看似符合消费者主观需求的决定都是由背后的经济选择机制塑造的。个体的想象力和自发性不再产生于其自身的心理机制，而是来自于文化工业的复制与延伸，大众意识变成了制造商意识的体现；当个体意识变成了文化工业的建构物时，个体也就丧失了对于现实反思和否定的能力。

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先河，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各种学派的传媒和文化研究取向。该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点。在当代文化评论中，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对大众传媒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但都可以见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

新革命理论

当资本主义进入发达工业社会阶段，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再是生产的匮乏和工人阶级的贫困，而是工业社会对人，也就是劳动者的本能和人性的摧残，现代生活中价值与意义的丧失使个体的心理结构遭到破坏和压抑。

有鉴于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中社会变革的途径和目标也只能是主观的、文化的、意识的、心理的革命。并且，实现这种社会变革的主体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经变得有产化，因而失去了以往的革命性。社会变革的力量需要寄希望于别样的“无产阶级”，即那些厌恶现存的生产方式的人，这些人包括知识精英、青年大学生、少数民族、社会底层的被遗弃者、失业者、流浪者等。正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与现存社会不同的价值和批判现实的可能，蕴藏着社会变革的萌芽。当然，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变革观。至于变革的途径和目标，他们则语焉不祥。